

歷史學家的技藝與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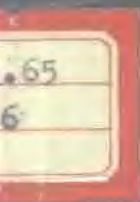
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

The Contribution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to the Theory of History



利科

Paul Ricoeur



歷史學家的技藝與貢獻

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

保羅·利科 著

王建華 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Kuala Lumpur Singapore Hong Kong Tokyo
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 Karachi
Nairobi Dar es Salaam Cape Town
Melbourne Auckland Madrid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Contribution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to the Theory of History*,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歷史學家的技藝和貢獻
保羅·利科著
上建華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城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520 0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洲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擴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錄

引言	1
一 批判的歷史哲學：雷蒙·阿隆	3
二 歷史學家的技藝：年鑒學派	8
三 歷史學家的技藝與歷史批判：亨利-伊雷內·馬魯	14
四 計量史學和系列史學	23
五 保羅·韋納與修史	36
六 展望：歷史學的理性和事件的命運	50
歷史人類學	52
精神狀態史	55
政治史的復歸	58
歷史學的理性：保羅·韋納和德·塞爾托	64

引 言

我想開門見山地對本書的研究範圍作一些限制，因為任何人想在一小時內就講清事情的原委，顯然都會受到一些限制。但我指的不是這種限制。當然，對於一本旨在盡可能豐富多采地論述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的論著來說，這種限制特別使人感到煩惱。

我所考慮的限制要具體得多。這些限制分為兩類。第一，我不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而是以哲學家的身份從事這項研究的。因此，我談到歷史研究時着重強調的並不是歷史學家的寫作方法論，而是他們對歷史知識的性質的論述。也就是說，我要對諸如歷史事件與自然事件的區別，歷史事實與社會事實，敘述與解釋，原因與規律之間的關係等等，進行批判的反思。

另外，我在研讀有關著作時，一直十分注意歐洲大陸國家所說的批判的歷史哲學與英語國家所說的分析的歷史哲學可能有哪些關係。它們的共同對手是「歷史哲學」，這一術語既有從黑格爾(Hegel)那裏獲得的至尊氣派，又有從施賓格勒(Spengler)，甚至從湯因比(Toynbee)那裏得來的通常是受藐視的意味。

不過，令我感興趣的倒不是它們都摒棄了思辨歷史哲學，而是二者立論的區別。分析的歷史哲學與其說是職業歷史學家的成果，不如說是精於邏輯理論的認識論學者的產物。而在法國，批判的歷史哲學大半是歷史學家的結晶。法國歷史學家雖然不

甚熟悉認識論方面的討論，但更接近於歷史研究實際。這個大致的比較引出了本書的第二個限制。那就是，我不僅要集中研究歷史知識的理論方面的問題，而且要選擇洞察力堪與分析哲學家相媲美的少數作者作為研究對象。

儘管上述兩個先決條件使本書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但也使本人在選擇論述的起點、中點和終點時有了充分的理由。我將以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所著《歷史哲學導論》(*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938) 作為出發點，接着闡述亨利·伊雷內·馬魯 (Henri-Irénée Marrou) 的《論歷史認識》(*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 1954)，最後是保羅·韋納 (Paul Veyne) 的《怎樣寫歷史：方法論》(*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 essai d'épistémologie*, 1971)。這三部著作加在一起，基本上確定了我的論述範圍。^①不過，我在論述過程中也將涉及職業歷史學家認為更能代表法國史學特點的若干著作，^②包括年鑒學派奠基人呂西安·費弗爾 (Lucien Febvre) 和馬克·布洛赫 (Marc Bloch) 的偉大宣言，他們的繼承人的一些著作、主要是費爾南·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 的著作，標誌着大轉變的計量歷史學 (或稱「系列」歷史學) 著作，以及目前的若干著作。當然，如果注重的是方法論而不是認識論，那就會從法國的重要史學著作開始立論。我將在最後一節，即第六節，對「新史學」的前景，尤其對史學理論與歷史「事件」的意義之間的關係，談一點個人看法。現在，讓我們大致沿着這條路綫作一番探索。

① 見本書第一節，第三節和第五節。

② 見本書第二節和第四節。

批判的歷史哲學：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在撰寫《歷史哲學導論》一書時，還不是日后人們熟知的那位社會學大師或歷史學大師。他當時只是一個哲學家，一個和他的朋友薩特（Satre）、梅洛-龐蒂（Merleau-Ponty）齊名的哲學家。他主要是按照德國人的模式——狄爾泰（Dilthey）、李凱爾特（Richert）、齊美爾（Simmel）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來觀察歷史學家的著作的。但是，這個消極方面卻得到了補償。因為這些哲學大師促使他作出了反思，促使他對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分界作出了高度科學的研究^①。因此，阿隆提出的是認識論和哲學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方法論方面的問題。他的《歷史哲學導論》研究了如何拓展歷史學領域的問題。我將首先考察此書第一部分所提出的事件概念。阿隆使用的概念既與庫爾諾（Cournot）相左，又與自然主義相悖。庫爾諾把自然事件和歷史事件都歸因於機緣，認為二者都具有偶然性；自然主義則把兩類事件歸因於進化。而對阿隆來說，歷史事件有其自身的基本特徵。他寫道：「人之所以有歷史，是因為他經歷了時間，因為他建立了傳世的業績，並收集了往昔的遺迹。」^②與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卡爾·亨佩爾（Carl Hempel）的歷史事件定義相比，阿隆的定義迄今仍完全有效。確

① 順便說一句，近50年來馬克斯·韋伯的影響與日俱增，保羅·章納對他的尊敬並不亞於阿隆。

② 阿隆：《歷史哲學導論》，1938年版，第37頁。

實，對波普爾和亨佩爾而言，物理事件與歷史事件在原則上並無區別，兩者都能夠出現於某種演繹推理的結論之中，一個以主張特殊的初始條件為前提，另一個以主張規律或一般假說為前提。

阿隆的觀點遭到了威廉·德雷和阿瑟·丹托的反對。他們認為，一個事件之所以具有歷史意義，是因為該事件能夠出現在作為整體加以把握的敘述之中。當然，阿隆並不是英語國家學者在討論中所說的「敘述主義者」。相反，他是作為一位不斷思索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來論述這個問題的。他強調的是意識具有的揭示歷史的能力，而不是敘述具有的表現歷史的能力^①。儘管如此，阿隆卻與那些反對波普爾模式和亨佩爾模式的人有着共同點，那就是十分關心要在人類史與宇宙史或生活史之間劃一條界綫。

我想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阿隆如何區分理解和因果解釋，並把它們聯繫起來。無疑，這個問題來自德國哲學，但阿隆的見解很有獨創性。一方面，他堅持認為理解和因果解釋屬於兩個不同層次，強調它們具有完全的獨立性，並用整整兩章的篇幅分別予以闡述。但另一方面，他認為歷史學是一門能使二者相遇而不會相合的學科。這樣，他就使自己對狄爾泰和韋伯都保持了距離。因為狄爾泰把解釋排除在理解之外，而韋伯則把二者融為一體。

阿隆所說的理解是指「明白易懂的、無須進行因果解釋的關於存在和人類行為的知識」^②。從根本上說，這種可理解性是歷史創造者賦予或能夠賦予其活動的性質。因此，歷史知識像理

① 只有在保羅·韋納的著作中，我們才能見到與海外「敘述主義者」相類似的推理。

② 阿隆：《歷史哲學導論》，第51頁。

解一樣，是日常生活層次上人的自身認識以及認識的延續。確實，阿隆從兩個方面緩和了他對理解的這番辯解。首先，他避免了過於注重心理因素的可能指責。因為他斷言，在客觀精神（黑格爾的術語！）與個人意識的背景無關，並能促進與歷史理解有關的各項工作的範圍內，歷史認識超出了心理學基礎。他的第二個糾正更加重要。他認為理解決不是直接來自生活經驗的一種直覺，而是一種重構過程（reconstruction）。人們在認識自身時是如此，即便這種認識轉瞬即逝；認識別人時更是如此，而且眾所周知，這種認識應該打上問號。客觀精神何嘗不是如此？客觀精神只有通過闡明使它潛沒於其中的各種業績才能達到。因此，阿隆從來不把理解與共鳴（sympathy）混為一談。正是在這個重構和理解的層次上，歷史認識遇到了第一個限制。每一項重構都要服從於各種解釋系統，因而不是顯得支離破碎，便是走向不成熟的總體化。

這個論點——我們應當記住它撇開了因果解釋所能作出的貢獻——引起了某些誤解。阿隆對這個問題的具體表述已經變為一種口號，如「理論先於歷史」^①，「客體的消失」^②，等等。前一句話僅僅說明了一個很有理由的觀點，即解釋是理解的前提，理論賴以表述的解釋多種多樣；先於歷史研究的理論只限於使各種解釋獲得具體價值^③。事實上，這個反實證主義論點與年鉴學派建立在歷史實踐基礎上的論點有聯繫，並加強了後者。第二句話只說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成為科學之前，沒有現成的、可以忠實地予以重建的歷史實在」^④。「讓·松·德雷就這樣

① 阿隆：《歷史哲學導論》，第93頁。

② 同上，第120頁。

③ 同上，第95頁。

④ 同上，第120頁。

死了」，這一事實只有根據由願望、動機和價值構成的體系，並把它與可以理解的總體連結起來，才成其為歷史事實。因此，各種不同的重構只是表明，在屬於理解範疇的客觀化與不重復的生活經歷之間，一開始就存在着鴻溝。

不過，阿隆沒有把自己束縛於理解理論。對他來說，理解只是先於他所謂的因果思維的步驟。理解尋求的是可以理解的整體，包括各種動機、原因和觀念，因果思維尋求的是規則。阿隆在談論因果思維時注意到，人類科學在解釋問題上已有許多傑出的範例，不僅有韋伯的著作作為代表，而且有法國社會學派的涂爾干（Emile Durkheim）和阿爾布瓦什（Halbwachs），以及以嚴謹著稱的西米昂（François Simmiand）經濟史學。面對這些傑出成果，歷史學即使不顯得被動，至少也能感受到來自雄心勃勃的競爭對手的強大壓力。正因為如此，阿隆力圖限制社會學解釋在歷史學中的地位。他堅持認為，「社會學的所有因果關係都是片面的，不確定的」^①，充其量只能產生片面的決定論。另外，他把社會學置於兩個層次（order）之間：其一是與理解相近的恰當的歷史因果關係，其二是使科學解釋與哲學思辨相近的歷史決定論。在這個由三部分構成的圖式中，阿隆見到了三種不同意圖（intention）在起作用，即法官的意圖，科學家的意圖和哲學家的意圖。歷史學家的意圖更接近於法官而不是科學家。科學家的意圖反映在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這裏包含的要點是，科學家的意圖本身是不夠的。

就我們的目的而言，最有趣的地方已不再是向歷史哲學的過渡，而是歷史學家的意圖與科學家的意圖之間的關係。阿隆小心翼翼地堅持認為兩者是獨立的，同時又十分謹慎地把它們聯

^① 阿隆：《歷史哲學導論》，第226頁。

繫起來。阿隆認為，它們是在歷史因果關係這個特定層次上匯合的，而歷史因果關係說到底就是以回溯性或然論（retrospective probability）為中介的個別事物之間的關係。正是在這一點上，阿隆的觀點與韋伯最相近。根據韋伯的說法，只有當歷史因素消失了或修正了，只有當人們構擬出不真實的演變過程並與真實事件相比較，才能對該歷史因素的影響作出評價。那麼，既然這個不真實的演變過程不是已知的一般規律，而且如此不確定，那又是甚麼呢？在這個或然論的天平上，最低限度是偶然性，最高限度則是韋伯所說的「適當性」（adequation）。但是適當性並不是必然性。

阿隆為甚麼堅持要對韋伯的回溯性或然論加以評論和修正呢？這是因為，第一，對適當性和偶然性的判斷是由人腦作出的，而不是存在於事物之中^①；其次，這一邏輯為人發揮主動性並負起責任留下了餘地（即使歷史學的倫理標準不同於法官，它的依據不是犯罪與否，而是結果如何）^②。在這裏，歷史學家的意圖與哲學家的意圖融為一體，並超出了科學家的意圖。哲學家的頭腦是用或然論邏輯武裝起來的，因而會抵制那種進行廣泛綜合的誘惑；在這種綜合中，偶然性被消除了，各個交叉序列相互抵消了，主動性也蕩然無存。阿隆寫道，這些傲慢的歷史觀支持了一種決定論，其本身就是「某種歷史哲學」^③。可以認為，阿隆在其著作的其余部分闡述了一種不同的歷史哲學，它說明了這種不真實構擬和回溯性或然論的前提。消極地說，這種哲學可以說成是對回溯性宿命論幻夢的鬥爭；積極地說，它把短暫性（temporality）與自由統一了起來，因而是歷史哲學與行動哲學的結合。

① 阿隆：《歷史哲學導論》，第168頁。

② 同上，第168頁。

③ 同上，第235頁。

歷史學家的技藝：年鑒學派

請允許我在論述阿隆和馬魯的著作之間插上幾句話，談談職業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我承認，這樣改變話鋒顯得非常唐突，但我必須這樣做。雷蒙的著作是高度的哲學思考，確有一條巨大的鴻溝把它與法國最優秀的歷史學家同期發表的任何著作分隔了開來。問題並不是歷史學家的作品都是平庸之作。恰恰相反。但我不妨說，這些作品都缺乏哲學頭腦。它們是衆多工匠爲反映本人技藝而創作的專著。這種割裂恰恰表明了法國歷史學認識方法論的特點：一方面批判哲學，另一方面設法完成歷史學家的實際任務。如果說這些作品絕非平庸，那是因爲它們處於歷史學實踐的潮流之中，並反映了法國歷史學派在史學實踐層次上的巨大變化。1929年，費弗爾和布洛赫創建了《經濟和社會史年鑒》(*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費弗爾是一位辯論家，他把論戰文章匯編成《爲歷史學面戰》(*Combats pour l'histoire*, 1953)一書。布洛赫首先是一位實踐家，他在《爲歷史學辯護：歷史學家的技藝》(*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一書中，提綱挈領地歸納了他們的理論。不幸的是，這部著作只寫了三分之二，他就被納粹殺害了。這些著作是對朗格盧瓦 (Charles Victor Langlois) 和夏爾·塞紐博斯 (Charles Seignobos) 50年前所寫的經典著作^①的回答，也是對年鑒所說

^① 《歷史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898年版。

的「歷史化的歷史學」還是「實證主義歷史學」的回答。其實，法國歷史學家在提及實證主義時，並不是指從維也納小組（Vienna Circle）以來的所謂邏輯實證主義，甚至也不是孔德（Auguste Comte）所說的實證主義哲學。姑且讓我來歸納一下他們賦予這個術語的一系列含意：首先，呼籲能與物理學家相媲美的客觀性，儘管物理學家不介入自己所研究的現象；把歷史學簡化為文獻的收集和考證（來源、日期、可信程度等等），簡言之，簡化為博學；認為現成的史實已經存在於文獻之中，就像萊布尼茨（Leibniz）所說，大力神赫丘利的雕像早已躺在大理石的紋理之中；認為解釋應限於把偶然事件聯繫起來，並遵循文獻賦予的編年順序；最後，認為歷史變革的最終傳導者是個人，而個人主動性得以發揮的渠道是模仿。總之，中性觀察、崇拜博學、經驗論、對偶然事件的決定論、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這就是年鑒學派立志要摧毀的一整套方法論。

年鑒學派反對實證主義者從外部觀察歷史往事，反對像觀察礦石一樣的冷漠態度；他們強調今昔之間的相互作用，毫不猶豫地認為當代事件能昭示歷史上迄今未引起注意的種種聯繫。因此，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第一章中宣稱，即使歷史學可以被定義為「處在時間長河中的人的科學」，那也並不意味着今昔之間的分離；而費弗爾則寫道，「歷史學：關於過去的科學，關於現在的科學」。

年鑒學派反對歷史學家屈從於文獻。費弗爾自豪地宣佈：「沒有歷史；只有歷史學家。」這一斷言與阿隆的言論十分接近，它使歷史學家保持了主動性，從而能恰當地提出問題，並有效地確立假說。至於說歷史學家「發現自己的工作早已有人在文獻中替他做好了」^①，年鑒學派也堅決予以反對。他們提出

^① 這句令人不快的話引自《歷史研究導論》，第253頁。

的概念是：歷史學家分析和重構的歷史「事實」是複雜的，難以窮盡的。確實，如果說歷史是關於以往人們一切活動所留下的行踪的知識^①，那麼，對這些行踪的解釋一直在改變着這種知識。「歷史觀察」^②是一種充分的觀察，它與物理觀察相比並不遜色。

年鑒學派反對那種認為歷史決定論可以用編年順序把個別偶然事件連結起來的觀念。他們提出了一種極為豐富的，關於人類時間的概念。他們借鑒了社會學、人口學和經濟學，而在這些學科中，人們談論的是結構、情勢、周期、增長等等。與此同時，歷史因果關係也不再束縛於有規則的演進概念。相反，他們設計出了一系列功能關係，而且未必遵循年代順序。

然而，他們真正要駁斥的是歷史學家最終應當研究個人的觀念。對他們來說，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是整個社會實在^③，並且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範疇，如經濟、社會、政治、宗教等等。

弄清上述最後兩點有甚麼聯繫是很重要的，即年鑒學派一方面拋棄了具有編年意義的事件，另一方面反對把個人當作歷史分析的最後單位。事實上，如果說推崇博學和經驗研究的歷史學曾非常強調個人，那是因為它特別偏愛研究政治史和外交史。正是在這種歷史中，事件猶如一聲爆炸，成了注意的焦點；也正是在這裏，軍政首腦、部長、外交家等被認為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年鑒學派發現，他們所認為的實證主義史學的主要特點，與政治史的統治地位之間隱藏着某種密切關係。所以，批判「事件史」和「戰爭史」，構成了呼籲研究人類總體史的前哨戰，而這種總體史非常強調經濟條件和社會狀況。在這方面，法

① 借用西米昂的話，後來布洛赫也引用過。

② 這是布洛赫著作的章節標題。

③ 借用馬塞爾·毛斯（Marcel Mauss）的話。